

收稿日期:2025-12-20

# 以别致形式书写深切内容

## ——论房伟小说《血色莫扎特》的美学追求

韩丽荣,徐国庆

(江苏海洋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房伟小说《血色莫扎特》以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为背景,以多声部叙事颠覆传统叙事方式,借助人物的碎片式独白,揭示了谋杀案的真相,在悬疑案件的外衣下重构了历史的复杂性。小说以“还乡”模式打破时空界限,通过“麓城谋杀案”的时空对话,将个体创伤与集体记忆交融在一起,使个体的命运抉择升华为对国企改革、知识分子困境等时代特征的深层书写,既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图景,又挖掘了人物的内在,以理性笔触映射出一代人的理想失落与命运挣扎,彰显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体现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血色莫扎特》;房伟;美学追求;多声部叙事;历史隐喻;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2-0118-07

**作者简介:**韩丽荣(2002—),女,江苏连云港人,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徐国庆(1992—),男,江苏徐州人,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校聘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sxb.1003-6873.2026.02.013

房伟以学者的深邃与作家的敏锐,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领域潜心深耕。在创作方面,房伟已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小陶然》等。凭借《英雄时代》获得茅盾文学奖新人奖之后,他开始将目光投向1990年代,倾情书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生命挣扎。《血色莫扎特》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之作,讲述了葛春风、韩苗苗、夏冰、薛畅、吕鹏等时代青年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人生沉浮。书中既有相爱相杀的爱情纠葛,也有时代转型之下的国企改革与官场法则。小说以麓城命案中的“凶手还乡”为始章,编织了一个个连环套式的谜团,连接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构建了一个真实又鲜活的文学世界,再现了时代转型下个体对生命的至善感悟。在这部小说中,房伟以碎片化视角完成了解构历史真相的主题,又通过时空对话与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依次展露了人物的生活脉络与内心世界。他以别致的形式传达了深刻的内容,体现出其具有主体性特色的美学追求。

### 一、碎片化视角与历史真相的解构

小说从一桩跨越十五年的悬案展开,这是一桩震惊麓城的“钢琴王子杀妻案”,随着电话里

传来沙哑的声音,“我是夏冰,我杀人了”<sup>[1]21</sup>,案件与人物开始一一浮现。艺术系的钢琴王子夏冰曾与芭蕾舞专业的韩苗苗有过一段金童玉女般的爱情故事。然而毕业后被分配至启明中学任教的夏冰,在与韩苗苗结婚三年后却成为涉嫌杀害妻子后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但这起案件仍然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与传统独白型小说不同,房伟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被动的被叙述者,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和主体性的个体。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表达对事件的看法与感受,形成“多声部小说”的特征。房伟在《血色莫扎特》中运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葛春风、吕鹏、薛畅三人的描述都以第一人称视角交替展开,各自构成独立的章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血色莫扎特》中的多声部叙事与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复调结构形成了呼应。后者曾在20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人物或者非人物作为叙述者交替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了发生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一桩谋杀案。房伟曾说:“我非常喜欢尤瑟纳尔、帕慕克这样的历史小说家。曾经一度,我迷恋于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试图从符号学的视角,洞察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都市的另类面孔。”<sup>[2]</sup>帕慕克通过细密画家、死者、凶手乃至蝴蝶的视角交替叙述,书写了一曲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挽歌。房伟则以葛春风等人的记忆,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二者皆消解了全知全能叙事的权威性,赋予人物独立的主体性。但帕慕克的复调更强调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房伟的复调则扎根于本土现实,刻画了特定年代国企改制的状况。

在传统独白型小说中,小说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常缺乏主体性。而在《血色莫扎特》中,所有人物都具有自我意识,作者让他们通过各自的陈述来展现复杂的心理活动,从而增添了小说的立体感。房伟曾提到:“小说创作过程中,我还是想让每个人物自己说话。”<sup>[3]114</sup>这种创作理念使人物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葛春风的理想主义、吕鹏的务实妥协和薛畅的权力欲望,都通过分章叙述呈现出来。小说的矛盾以共时性空间结构展开,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多声部的叙事手法,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也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读者能够在多视角的参差中感受到叙述传达的深层意义。

房伟在小说中精心建构了一个明暗交织的双线叙事模式。显性线索紧紧围绕着“韩苗苗被杀案”这一核心事件展开,借此引出复杂的情爱关系与种种社会问题:葛春风、韩苗苗、夏冰之间存在三角恋爱关系;化工厂与天鹅夜总会之间存在利益勾结。而暗线则是“冯露夏雨复仇记”,两个与夏冰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精心策划了一场死亡邀约,以灵魂复仇之名,对夏冰之死的相关者实行命运裁决。整部小说采用中年视角追忆往昔,爱情与惩罚交织于故事之中,无论是野猫与天鹅的畸恋,抑或红姑与陈市长的爱恨情仇,均显示了作者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房伟通过细节刻画、人物自述与他者视野的多维度塑造,有效避免了传统推理小说中人物脸谱化与概念化的弊端。即便是红姑,其形象也并非简单的善恶,而是具有人性独有的复杂。主人公葛春风的形象塑造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身上凝聚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折射出时代赋予那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这不是叙述者强制赋予的。正如巴赫金所说:“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sup>[4]29</sup>在小说命名上,房伟也蕴藏深意。书名中的“血色”二字,讲述了一桩谋杀案,而之所以有“莫扎特”,则不仅因为主要人物喜欢弹钢琴,还因为小说中涉及的12支莫扎特曲子,使小说产生了“复调”效果。多个声部同时展开,且各个声部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莫扎特之死”这一音乐史上的谜团,也与小说情节形成了呼应与“互文”性。

除此之外,小说情节的展开也离不开碎片化视角的运用。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常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于传统叙事中的整体性结构,它将原本完整的故事拆解成零散的碎片,通过重新组合,使小说呈现出非线性结构。碎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多元化的叙事模式,小说通过不同人物

的交替视角推进情节发展,不同视角各自独立成章,为读者提供不同的信息,使案件真相并非单一呈现。《血色莫扎特》穿插了韩苗苗的日记、冯露的信件等文本,不仅直接呈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让读者能更加全面地看到案件的本质。这种手法有意模糊时空界限,串联起历史事件,进而以点带面,展现宏大的时代主题。人物的回忆与现实场景相互融合,增添了叙事的层次感,同时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相较于《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细密画技法,《血色莫扎特》的碎片化叙事更具现实主义色彩。前者试图重构历史的完整,而后者则不断探寻事情的真相。房伟借助碎片化书写,描绘出麓城的人与事,突破了时空界限,映射出1990年代的集体记忆。

小说在结构上与《白夜行》《我的名字叫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存在显著的叙事学互文性。三者皆采用网状叙事,但美学追求迥异。具体来说,东野圭吾的《白夜行》揭露了人性之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以艺术手法探讨帝国文明,而《血色莫扎特》则直指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矛盾。葛春风的困顿映射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陷落,吕鹏的世俗反映了其在规训下的妥协。似乎每个人都是主要人物,小说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界限并不明显,众声喧哗之中,自然形成了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复调性,在《我的名字叫红》中表现为宗教与艺术的对话,在《血色莫扎特》中则表现为社会转型之下的文化反思。小说中频繁出现记忆闪回与视角跳转,小说的开放结局也为读者提供了多个可填充的“空白点”。可见,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全知全能的作者声音,复调文本中,不同人物、思想或声音以平等、独立的方式共存。作者不主导或评判任何一方,不参与任何价值判断,而是赋予每个声音自主性。

复调小说作者放弃的,并非自己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作者与主人公之间重建一种新型的主体性关系<sup>[5]96</sup>。房伟并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控制小说人物的命运,而是刻画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复调以一种思维方式展现了当代人的生存面貌与精神状态。小说的多声部叙事不仅有对案件真相的揭示,更有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层挖掘。在美学追求上,《血色莫扎特》继承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后现代碎片化手法。房伟在技法上大胆突破,将复调叙事与本土现实紧密结合,将西方现代派技巧与1990年代的国情融合,创造出富有历史厚度的文本,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启示。这种多声部呈现与碎片化结构,解构了历史真相,也为主人公的“还乡”提供了叙事载体。人物在重返故乡时,正是通过记忆闪回与不同视角的历史追溯,实现了与时代的对话。

## 二、“还乡”模式与时空对话

当代小说中的“还乡”模式,可追溯至鲁迅《故乡》《祝福》等开创的“离乡—返乡—再离乡”这一经典叙事模式。《血色莫扎特》延续了这种叙事模式,小说情节以“凶手还乡”的倒叙手法展开,通过时空转换,将人物轨迹与时代的变迁紧密交织,使“还乡”成为审视时代的透视镜。葛春风自1995年开始,就在国营东风化工厂做一名工人。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工厂倒闭,他被迫成为再就业大军的一员。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开始在街头摆摊,以卖凉皮、烤面筋维持生计。后来,他抓住时代机遇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省城成为一名报社记者。当再次踏上麓城这片熟悉的土地时,葛春风心中五味杂陈。此时,故友薛畅已从当年平庸的大学生一跃成为市委办公室秘书,吕鹏也在市刑警队步步高升,官场得意。小说最后,随着葛春风再次离开麓城,这座城市又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共享单车出现了,新建筑已然崛起,红星机械厂破产与黑车行业被整顿。这些都彰显着现代化城市的活力,也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与新秩序的建立。

房伟曾在访谈中提到:“麓城的改革背景,一些人物的经历,和一场谋杀案,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这个过程,会促进大家的一种理解,对时代和现实的理解,这里还有一种暗示,或者说隐喻。”<sup>[3]114</sup>换言之,作者与小说人物具有一段类似的经历,葛春风这个人物就是作者自我的情感投射。作为1990年代国企改革与下岗潮的亲历者,葛春风的人生跌宕浓缩了一代知识分子

的集体困境:从天之骄子到车间工人,再到街头摆摊者,最终通过考研实现阶层跨越。其命运曲线既是个人奋斗的轨迹,亦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理想主义失落的隐喻。小说通过“离乡—返乡—离乡”的叙事循环,将麓城塑造成承载个人理想的母体空间。

此外,小说也构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骄傲的天鹅”“桀骜的野猫”“高贵的麋鹿”等意象具有张力,书写着被碾碎的理想主义。小说中“苗苗的客厅”构建了独特的空间意象,失意的青年才俊们围聚于此,以酒畅怀,高谈阔论。他们都是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牢骚满腹却不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片天地短暂地隔绝了现实世界,成为他们寄存理想的精神桃源。小说中“蛇”的意象也贯穿文本,其贪食自噬的特性成为人性欲望的深层隐喻。“一条贪心大蛇,不停吃东西,越吃越长,最后咬掉最后的尾巴,游戏也宣告结束。”<sup>[1]177</sup>蛇象征着人类的欲望,小说形象地勾勒出人因欲望无度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过程。蛇的每一次吞噬,都可以视为对人性中某个层面欲望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是暂时的,且往往伴随着更大的空虚与不满足感的滋生。有学者指出:“房伟并没有把《血色莫扎特》写成处处隐藏着隐喻、象征的具有现代或后现代特征的文本,而是凸显了小说故事性,这并没有削弱小说的象征性品格。”<sup>[6]120</sup>“返乡”模式揭示了当代“零余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成为展现1990年代浮世绘的重要符号。葛春风试图在故乡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归属,但当他真正回到麓城,却发现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曾经熟悉的街道与老友的面容,都被时代的浪潮改变。小说通过对比,凸显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奈与迷茫。

房伟说:“我是一个从小就有些英雄情结的人。”<sup>[7]</sup>这种情结不仅源于作者的经历,更体现在他对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深刻洞察中。葛春风的父亲是1980年代的化工厂老工程师,为了支援项目建设,被分配到偏远的麓城化工厂。1998年夏天,轰动全省的东风化工厂“7·14特大爆炸案”突发。葛春风的父亲为了保护企业安全,阻止一场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化工事故,自己不幸牺牲。多年后,这个化工厂由于种种原因难以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葛春风在此时挺身而出,为爆炸事故中的工人讨要说法。他像他的父亲一样,牺牲自我的利益,成全工厂的工人,历史形成了循环。有学者指出,在精神寻找书写中,葛春风向父亲致敬的行为无疑具有典型的“寻父”意义<sup>[8]85</sup>。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英雄主义的诠释,更是对生命力量的礼赞。葛春风这个曾被誉为了麓大中文系第一才子的人物,在命运的转折中,又不断拾起青春回忆。这不仅是主人公葛春风个人的命运书写,更是房伟对自身经历的回溯。房伟巧妙地运用悬疑手法,将小说置于金融风暴、国企下岗等大时代背景下,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剧烈变迁。

房伟的创作源于他对年轻时基层工作经历的深刻记忆,他希望通过作品反映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集体经验。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敏锐捕捉时代的变化浪潮,同时以先锋笔法来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小说通过“离乡—返乡—再离乡”这一模式,使“还乡”成为审视时代的镜子,延续了鲁迅开创的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房伟吸收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通过丰富的意象构建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世界,洞察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市的另类面孔。同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本雅明开创的“闲逛者”形象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闲逛者”是指那些因现代城市的兴起而游荡在城市的人。房伟延续本雅明“闲逛者”的书写传统,将葛春风塑造为时代的见证者。同时,传统叙事中故人重逢的知己模式被完全重构,葛春风与昔日玩伴的重逢夹杂着怀疑,呈现出异质性。但不同于西方理论,房伟在保持故事性的同时,突出表现象征性品格,使小说更具可读性与思想性,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还乡”模式为了解人物命运提供了现实根基,与此同时,房伟通过设置虚构情节也实现了小说的艺术真实。

### 三、真实与虚构的交互融合

所有的艺术手法与叙事模式都指向对现实的真实观照。房伟以现实主义精神将形式与内

容融合在一起,最终抵达了美学的落点。托马斯·沃尔夫曾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sup>[9]31</sup>《血色莫扎特》虽然写的是一桩谋杀案,但其核心却是对70后青春记忆与时代转型中普通人命运的深刻书写。“哪怕再轻的鸿毛,也是从鸿雁身上拔下来的,活生生的,带着血的鸿毛,每一根鸿毛在我眼里跟泰山一样重。”<sup>[10]</sup>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房伟1997年大学毕业后便在国企工作,最初三年在肉制品加工厂从事基层工作,劳动强度极大,又恰逢金融危机,工资常数月延迟发放。2002年,他凭借自身努力考取研究生,最终成为高校教师。小说中的诸多场景,正是房伟自身青春岁月的真实写照。作者在文本中融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知识结构,使小说兼具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与深厚的人文关怀。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精妙的笔法书写,不仅刻画了那个时代人们所遭受的生存压力与内心创伤,更将冷峻的社会剖析与青春的感伤真诚融为一体。这些特质使小说在悬疑推理的框架之上,具有浓厚的文学性。

相较于80后作家对新时代的憧憬,70后作家更注重对个体成长历程的细腻体察。小说以刑事案件推动情节发展,聚焦关键事件,为深入思考时代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切入点。2001至2002年,分管工业的陈副市长推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关停并转,股份合作”的政策,市内几家大企业纷纷响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然而,改革的影响也随之而来,许多企业因经营困难而无法按时发放工资,工人陷入生计困境。个体生存的艰难,直接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小说中,东风化工厂作为首批参与改革的大型国企之一,在改革十周年之际举行会演,特意排演了大型话剧《乔厂长上任记》,这一情节巧妙地暗示了时代发展的大潮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通过小说结尾处葛春风再次离乡的旁观视角,作者生动地描绘出改革后的麓城:街道变得更加干净整洁,公厕数量显著增加,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洗浴中心、养生会所与棋牌室经过整顿后秩序井然,房价也一路飙升。随着高铁即将开通,麓城的房价预计还将进一步上涨,目标在未来二十年内跻身GDP万亿城市之列。正如小说中写道:“一个轰轰烈烈的残酷时代过去了,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又飞速来临,这世界变化太快。”<sup>[1]304</sup>作品围绕工人阶层的生存困境展开,揭示了转型期底层群体的彷徨与失落,主人公葛春风的角色,更是折射出寒门知识分子在变革洪流中受制于出身与体制桎梏的困境。

房伟认为,文学创作是对其青春岁月的总结与反思,核心在于剖析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轨迹。葛春风的命运起伏,正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难以逃避的宿命。正如学者指出:“房伟的小说不仅通过回到历史现场探求人心与人性的所向,同时专注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不仅敏锐切入个体和群像的裂变,同时映射历史横断面中的主体抉择和灵魂彷徨。”<sup>[11]105</sup>房伟小说的叙事聚焦于中年群体与知识阶层的生存,反思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小说中的冯校长与市长陈中华,看似正派,实则道貌岸然,西装革履下掩藏的是肮脏交易和龌龊思想。陈中华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成为卖淫团伙的保护伞,还诱骗女下属满足自己的肉欲。小说以贪食蛇隐喻个体欲望膨胀导致的自我吞噬,也反面赞扬了人性的真善美。正如房伟提出:“很多人认为,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这么一个过程,解放了人性,也伤害了人性。权力控制对人性是一种伤害,那么欲望至上对人性是否也是一种伤害?”<sup>[12]26</sup>在省报当记者的这些年,葛春风开始写有偿新闻,接受各方面的红包,找企业报销各类乱七八糟的发票,开始习惯于对上送礼拍马屁,对下狐假虎威。小说囊括了1990年代年轻人的青春记忆与几十年来中国重大的社会现实,这不仅是一代青年的成长史,更是社会改革的变迁史。作者把凶杀案置于那个尘土飞扬的时代,巨轮碾过,让我们在故事之外悲痛和反思。

《血色莫扎特》披着悬疑小说的外衣,但房伟还是将其归类为现实主义作品。房伟认为:“现实主义首先不是一种技法,而是一种精神,要关注现实,关注广泛在你身边发生的现实,关注其它地方发生的现实,并用自己的文笔真诚表达出来。”<sup>[10]</sup>现实绝非机械的记录,而是经过艺术加

工之后的美学真实。虚构主要体现在故事的形式上,既要符合时代和人物的特点,又要契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而优秀的文本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将虚构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部小说源自现实,故事只是它的外壳,在悬疑故事的背后,作者希望通过故事引发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在时代巨变之际,爱情、亲情、友情,甚至生命,有时候是如此脆弱。时代巨轮轰隆向前,个人的命运、个人的血肉,不过是时代巨轮的润滑剂,而文学是生命记忆的同情者、唤醒者。文学看似是想象,是虚构,是梦境,可它却拥有真实的特质,在雅俗之间纵横捭阖,而不失人性之真、人性之实。小说结局看似出人意料,但在情理之中,其在情节上有通俗小说的生动,在内容上又有严肃文学的思想深度。房伟以简洁有力的语言与叙述,将人物置于国企改革下岗潮的时代背景中,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失落与理想的破灭,使得小说充满了张力。

作家的创作不仅有生命体验与社会经验,更有其情怀与知识。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房伟与一般作家的区别在于,他拥有深厚的知识结构与学术修养。毫不夸张地说,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理性的、学术性的理解和判断,是支撑学者型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每位作家的成长路径各异,房伟的成功在于他能将知识与故事性完美融合,使作品兼具历史深度与可读性。房伟本人也认同“小说要写得好看”,注重人物塑造的多面性。他提出:“学者进行创作时,一定要让学问和知识,成为一种潜在层面的思想和艺术的背景,而不是越俎代庖,放弃独特艺术形式的探索,让理性思维支配自己。”<sup>[13]128</sup>小说《血色莫扎特》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透露出生命的韧性,因此,即使在描绘生活阴暗面时,也能展现出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想象往往构成通向超真实的路径,代表着人们主观上超脱现实的欲望。房伟的创作验证了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即虚构非但不削弱真实,反而成为穿透现实表象的显微镜。与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类似,小说的开头留给读者一个大大的悬念与空白,作品每章的视角都在发生着变化。表面上看似不连贯的情节,实际上是在谈论同一件事,但用了不同的角度,这就需要读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阅读过程中自己去填充和阐释。房伟的美学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变化才有历史,有主体性的文学才真正需要现实主义,这也是中国文学真正在世界上走出独立主体性特色的契机”<sup>[3]116</sup>。

#### 四、 结语

小说《血色莫扎特》既延续了“青春悼亡”的抒情传统,又以先锋笔法突破先前类型文学的边界。当侦探故事的外壳脱落,裸露出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房伟的独特之处在于平衡了理性与文学性,他以学者视角解剖历史,又以小说家的敏锐捕捉市井的细微之处,使文本具有诗性光芒。著名学者杨庆祥曾高度评价这部小说,他认为《血色莫扎特》是一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房伟“以别致形式书写深切内容”的美学追求,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sup>[14]</sup>。诚然,房伟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融合,以其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深刻的思想性,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审美格调的雅俗融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拓展。作为新时代的跨界写作者,房伟展现出对时代动态的敏锐捕捉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够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以美学的形式将二者融合在作品之中。批评与创作作为文学表达的两种形式,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唯有坚持“表述”的文学自觉,才能不断进步。可以说,房伟以一名学者的理性深度与作家的感性笔触,在文坛中成功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创作路径。

#### 参考文献

- [1] 房伟. 血色莫扎特[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2] 房伟. 有关“符号”的战争:《阳明山》创作谈[EB/OL]. [2025-10-10]. [https://www.sohu.com/a/317832613\\_](https://www.sohu.com/a/317832613_)

202823.

- [3] 房伟,唐胜琴. 著名作家房伟访谈录[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0,32(6):113-116.
- [4]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玲,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5] 列夫. 复调小说理论的矛盾探析及其对中国文论发展的启示[J]. 中国文学批评,2019(1):86-97.
- [6] 郝敬波,李晨宇. 小说意象世界的建构与探索:评房伟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J]. 百家评论,2020(3):115-120.
- [7] 房伟. 在和平年代如何书写英雄[EB/OL]. [2025-10-15].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l/2021/0128/c404032-32015123>.
- [8] 高春民. 时代的精神烛照及其艺术“调性”:评房伟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2):84-89.
- [9] 沃尔夫. 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M]. 黄雨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0] 余梓宏. 房伟谈新作《血色莫扎特》:70后也有他们的悲欢离合[EB/OL]. [2025-10-10]. <https://www.dutenews.com/n/article/1423443>.
- [11] 曾攀. 锋锐与钝感:论房伟小说的理性意识[J]. 东吴学术,2024(2):105-110.
- [12] 房伟,张丽军. 多声部、创新难度及重寻大师的可能: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对话[J]. 艺术广角,2008(2):23-30.
- [13] 房伟. 论“学者型作家”与“作家型学者”[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24-129.
- [14] 《血色莫扎特》(长篇小说)[EB/OL]. [2025-10-15]. <https://www.jszjw.com/book/20201103/1604382361539>.

## On the Aesthetic Pursuit in Fang Wei's Novel *Blood Mozart*

HAN Lirong, XU Guo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China)

**Abstract:** In his novel *Blood Mozart*, Fang Wei take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90s as the background,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ode through polyphonic narration. It reveals the truth of the murder, through the characters' fragmented monologue, reconstructing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in the veil of murder case. The writer breaks the boundary of time and space through the return home pattern, and blends the individu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the temporal spatial dialogue about the murder case. The writing of individual's fateful choice has evolved into in-depth writing of the 1990s, such as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dilemma of intellectuals. This work presents not only the conflict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but also the soul of the characters. Fang Wei rationally depicts the disillusion and struggle against destiny, and highlights the brilliance of human nature, as the result of his unique aesthetic pursuit.

**Key words:** *Blood Mozart*; Fang Wei; aesthetic pursuit; polyphonic narration; historical metaphor; realism

[责任编辑:王建霞]